一个人的遭遇

米·肖洛霍夫

献给一九○三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叶夫盖尼雅·格里高利耶夫娜·列维茨卡雅

在顿河上游,战后的第一个春天显得十分爽郎,特别蓬勃。三月底。从亚速海一带吹来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两天两夜,就把顿河左岸的沙滩明白地显露出来;草原上积雪的谷地和宽涧也膨胀起来,小河被凿开冰面,汹涌奔流,这样一来,道路就简直无法通行了。

在这交通阻塞的倒霉的日子里,我偏巧要到布康诺夫镇去一下。距离不能算远,总共才六十公里光景,但要走完这段路,可并不太简单。我跟一个同志在日出之前出发。一对喂得饱饱的马,紧紧地套上挽索,勉强拖着一辆沉重的马车。车轮陷在混和着冰雪的湿漉漉的沙地里,一直陷到轮毂。在一小时以后,在马的腰部和大腿上,在后鞧绁细皮带下,已经密密地出现了一圈圈白色的汗花,同时在早晨新鲜的空气里,强烈而醉人地散发出马汗和暖烘烘的柏油的味儿——马具上涂过大量的柏油。

碰到马十分难走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步行。浸水的雪在靴子底下发出吱咕咕的声音,走起来也很吃力;道路的两旁还结着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冰,被阳光照得像水晶一样闪闪发亮,那里就更加难走。走了六小时光景,才走了三十公里,就来到叶蓝卡河的渡口。

这条河并不大,在莫霍夫斯基村前面,夏天里有几处常常干涸,现在那赤杨丛生的河滨的沼地上,河水泛滥了整整有一公里宽。要渡河就得乘一种不稳的平底小船,这种船载重不能超过三人。我们把马打发回去。在对岸集体农庄的木板棚子里,有一辆饱经风霜的老爷吉普车在等着我们,这还是冬天留在那边的。我跟司机两人提心吊胆地跳上这破旧的小船。那位同志和行李就留在岸上。船一解缆,在腐朽的船底里,水就像喷泉一样从好几个地方喷出来。我们用手头的一些东西堵上漏洞,一路上又舀着船底的水。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叶蓝卡河的对岸。司机从村庄里放出车子,便走到船旁,拿起桨说:

“这个该死的木盆要是在水里不垮台,也许再过两个钟头可以回来,不会再早啦。”

村庄远在一边,埠头附近一片寂静。这种冷淡的光景,只有在深秋和初春人烟稀少地方才有。河里飘来潮湿的水气,还送来腐烂的赤杨树的苦涩味儿,但从那迷失在紫色雾霭中的遥远的霍皮奥尔河草原那边,微风送来了刚从积雪底下解放出来的土地的永远新鲜地又难以捉摸的香气。

附近的河滩上,横着一片倒下的篱笆。我在篱笆上坐下来,很想抽支烟,但是,伸手到棉袄的右边口袋里一摸,才发现那包白海牌纸烟已经湿透,可真是懊恼极了。在渡河的时候,被浪打低沉的船舷上泼进来,混浊的河水一直泼到我的腰部。那时我可没工夫想到烟,我得抛下桨,尽力地把水舀出去,使小船不至于沉没。现在却常常地后悔自己的疏忽。我小心翼翼地掏出那包泡过水的烟,蹲下身去,把因潮湿变黄的烟卷一支支摊在篱笆上。

已经是中午了。太阳照得像五月里一样热。我希望纸烟快些

晒干。太阳照得那么热,我真后悔不该穿士兵的棉袄裤出来。这是开春以来真正暖和的第一天。就这样独个儿坐在篱笆上,完全置身在寂静和孤独中,而且摘下头上那顶旧的军用暖帽,让微风吹干因为用力划船而被汗湿透的头发,茫然地凝视着那飘翔在浅蓝色天空中的朵朵白云,真是舒服极了。

一会儿,我看见有个男人,从村庄尽头的房子后面走来。他手里拉着一个很小的男孩子,按身材看来大概五六岁,不会再多。他们吃力地朝埠头蹒跚走着,到汽车旁边,转身向我走来。这是有一背有点驼的高个子,走到我跟前,嗓子低沉地说:

“你好,老兄!”

“你好!'我握了握那只冲我伸来的又大又硬的手。

他又向孩子弯下身去说:

“向伯伯问好,乖儿子。你瞧,他跟你爸爸一样,是个司机。只不过咱们开的是大卡车,他开的可是这类小车子。”

那孩子用一双天空一样清澈的蓝眼睛朝我望望,露出一丝笑意,大胆地伸给我一只嫩红的冰凉小手。我就轻轻地握了握它,问;

“你这个老头儿,这手怎么这样冷啊?天气这么暖和,可你却冻坏啦?”

小家伙显出天真动人的信任神气,依在我的膝盖上,惊奇地扬起两条淡白的眉毛。

“伯伯,我怎么是老头儿呢?我可是个小孩子,我完全没有冻坏 ;手冷,那是因为抛过雪球了。”

那父亲除下干瘪的背囊,则懒洋洋地在我身旁坐下来说:

“带着这种客人真倒霉!他简直把我累坏啦。你的步子迈得大一点,他就要跑步了。嘿,要迁就这种步兵真伤脑筋。一步路得分三步走,可这样他是跟不上我,就像乌龟跟不上大马一样。可你

又得随时留意他。你一转身,他还是溜到大水洼去玩,就是在什么地方折下一条冰管儿,像吃糖一样吃起来。不,带着这种客人旅行,真不叫男人干的事,何况还得步行呢?”他沉默了一下,然后问:“你怎么,老兄,是在等你的首长吗?”

我觉得不便向他说明我并不是司机,就回答:

“得等一会啦。”

“他们准是从对岸来吗?”

“是的。”

“你知道船就快到了吗?”

“怕要过两个钟头吧。”

“那么得等一阵了。嗯,那咱过来歇一会儿吧,反正我也不忙着上哪儿去。刚才我走过来一看:有个咱们的司机弟兄的车抛锚了,就想,要让我去跟他一块儿抽阵烟吧。抽烟也罢,死也罢,一个人总很难受。你的日子过得倒不错呀:抽纸烟。看样子,你把纸烟弄湿了,是不是?嘿,老兄,泡过水的烟,就好像害过病的马,说什么也不中用啦。还是过来抽抽我的辣烟草吧。”

他从草绿色单裤的插袋里,掏出一只卷得像管子的、红绸做的破旧烟荷包来。他打开烟荷包,我看到它角上绣着一行字:“送给亲爱的战士,列别江中学六年级女学生赠。”

我们吸着很辣的土烟草,沉默了好一会。我正想问,他带着孩子上哪儿去,有什么事逼他在这种泥泞的日子赶路,但他抢走我的前面问:

“你怎么,战争期间一直在开车吗?”

“差不多一直在开。”

“是在前线吗?”

“是的。”

“咳,老兄,我在那边可是吃够苦头啦。”

他把一双黧黑的大手搁在膝盖上，拱起了背。我从侧面望了望他，不知怎的突然感到很难受……你们可曾看到过那种仿佛沉浸在极度悲痛中、充满了绝望的忧郁、叫人不忍多看的眼睛吗？在这位偶然碰到的对谈者的脸上，我看到的，也就是这样一双眼睛。

他从篱笆上折下一条变曲的枯枝，默默地拿它在沙土上划了一阵，划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图形，这才开了口：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觉，在黑暗中睁大一双眼睛想想：唉，生活，生活，你究竟干吗要那样折磨我？为什么要那样惩罚我？不论黑夜、不论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不，永远得不到！”他忽然醒悟过来，亲热地推着儿子说：“去吧，宝贝，到河边玩去，在大河旁边孩子们总可以找着点儿什么的。可得留神，别把脚弄湿了！”

刚才当我们默默地吸烟的时候，我斜眼瞧瞧这父子俩，就惊奇地发现一个我觉得很古怪的情况。孩子穿得很简单，但衣服的料子很牢固：一件旧的薄羊皮统子的上装，前层长了些，不过很合身；一双玲珑的小皮靴，稍微宽大些，里面还可以穿一双羊毛袜；上装的一只袖子曾经撕破过，但又很精细地缝上了——这种种都说明一个女人的照顾，一双能干的母亲的手。父亲的样子可不同了：棉袄上有好几个地方都烧了洞，只是粗枝大叶地补上；破旧的草绿色裤子上的补丁，不是好好地缝上去，而是用稀稀落落的男人的针脚钉上去的；脚上穿着一双几乎全新的军用皮鞋，可是一双很厚的羊毛袜却被虫蛀破了。它们没有接触到女人的手……当时我心里想：“要不是个鳏夫，就是和妻子的关系搞得不好。”

他用眼睛送走儿子，低沉地咳了几声，重又开口。我全神贯注地在听着：

“开头我的生活过得平平常常。我是伏龙涅什省人，一九○○年生的。在国内战争中参加过红军，是在基克维泽师里。在饥饿的一九二二年，上古班给富农当牛马，总算没有饿死。可是父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母亲和妹妹都在家里饿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无亲无故、孤苦伶仃。嗯，一年后从古班回来，卖掉小房子，来到伏龙涅什城里。开头在木工合作社干活，后来进了工厂，做上了钳工。不久结了婚。老婆是在儿童保育院长大的。是个孤女。可真是个好姑娘！又快活，又温柔，又聪明，又体贴，我可确实配不上她。她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苦难，也许因此养成了这样的性格。旁人看来，她也不见得怎么样出色，但是要知道，我并不是旁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对我来说，天下再没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我下工回家，筋疲力尽，有时候就凶得像只恶鬼。你粗声粗气对待她，她决不会用粗言粗语回答你。不，从来不会，她又娴静，又亲热，不知道怎么样对待你才好。我们的收入虽少，她还是努力让你吃得又香又甜。你向她瞧瞧，气也消了，过一会儿就会去拥抱她，还会说：对不起，亲爱的伊林娜，我对你太粗暴了。你要知道，今天我干活很不顺利。所以我们又太太平平，我自己也觉得心安理得。嘿，老兄，你知道这对工作有怎么样的意义吗？第二天早晨，我一骨碌爬起来，来到厂里，不论什么活到了手里，都顺顺当当，头头是道！瞧吧，家里又有个贤慧的老婆，有着怎么样的意义。

“有时我领到工钱，有时跟同志们去喝一杯。有时喝了酒回家，一路上踉踉跄跄，那副样子旁人看来一定是很可怕吧。你会觉得大街太狭窄，自然更不会说小巷子了。那时候我是个强壮的小伙子，身体结实得像魔鬼，很能喝酒，就是醉了，也还能自己走回家去。不过，有时候最后一程路只好放了头挡，那也就是说，爬了回去，但还是爬得到的。可她对你既不责备，也不叫嚷，更不吵闹。我的伊林娜只是笑笑，连笑也要笑得很小心，怕我喝醉了酒动气。她一面给我脱鞋，一面细声细气地说：安德留沙，你靠墙睡吧，要不睡着了会从床上滚下来的。嗯，我就如一袋麦子一样倒下了，什

么东西都在眼睛前面晃动。只在睡意朦胧中,听到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嘴里喃喃地说着亲热的话,这是说,她在疼我……

“早晨她在上工前两个小时就把我叫起来,让我好活动活动身子。她知道,酒没有醒,我是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的。嗯,她就拿出一条酸黄瓜,或者还留什么清淡的东西,又倒下一小杯伏特加,说:‘喝一点儿解解酒吧,安德留沙,只是以后别再喝了,我的好人儿。’难道还可以辜负这样的信任吗?我喝完酒,用一双眼睛默默地谢了她,又吻了吻她,乖乖地上工去了。如果在我喝醉的时候,她粗声粗气,吵吵闹闹,那么,有老天爷在上,我到第二次还会去喝个够的。有些家庭就是这样子的,做老婆的傻得很。这种傻婆娘我可见得多了,这我知道的。

“不久我们有了孩子。先是生了个儿子,过了几年又生了两个姑娘……从此我和同志们不再来往了。全部工钱都拿回家去,家里人口也多了,全顾不上喝酒。碰到休息日喝一杯啤酒,而且只要一杯,决不多喝。

“一九二九那年,汽车吸引了我。我又学会了开车,就开起卡车后。后来着了迷,不想再回工厂了。我觉得开车有趣多了。就这么过了十年,也没注意时光是怎么过去的。过得就像做了一场梦。嘿,十年算得了什么!你可以随便问问哪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可曾发觉日子是怎么过去的?一点也不曾发觉的!往事就像那迷失在远远的雾中的草原。早晨我出来的时候,四下里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走了二十公里,草原就被烟雾笼罩了,从这边望过去,已经分不清哪儿是树林,哪儿是野草,也辨不请哪儿是耕地,哪儿是草地了……

“这十年间我白天黑夜地干着活。我的收入非常好,我们的日子过得不比人家差。孩子们也叫人高兴;三个人学习的成绩都是

‘优’,儿子阿拿多里对数学特别有才华,连中央的报纸都提到过他。他对这们科学哪来那么大的才能,嘿,老兄,可连我都不知道。不过这使我觉得脸上很光彩,我替他骄傲,是的,真为他骄傲!

“十年间,我们稍微积蓄了一些钱,在战前盖了一座小房子,有两个房间,还有贮藏室和走廊。伊林娜又买了两只山羊。人生在世,这还需要什么呢?孩子们吃的是牛奶湖,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鞋穿,可以说心满意足了。只是我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划给我的那块地皮,面积有六百平方米,离飞机厂不远。要是我的小房子盖在别的地方,生活也许会换一个样子了……

“这时候战争爆发了。第二天军委就来了通知书,第三天就得上军车。我那一家四口都来送我:伊林娜、阿拿多里和两个女儿——娜斯金卡和奥柳施卡。三个孩子都很坚强。嗯,两个女儿总难免眼泪汪汪。阿拿多里只是抽动肩膀,好像怕冷一样,他那时已经十六岁了,但是我的伊林娜……我们共同生活十七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那种样子。那天夜里,我那件衬衣的肩膀和胸口这儿都给她的眼泪湿透了,第二天早晨也是一样的情形……走到火车站,我真不忍瞧她:嘴唇哭肿了,头发从围巾里散露出来,眼睛混浊而没有表情,就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指挥员宣布上车,她却扑在我的胸上,双手紧紧地勾住我的脖子,浑身发抖,好比一株刚砍倒的树……孩子们也在劝她,我也劝她,——毫无用处!别人家的女人跟丈夫、跟儿子谈着话,我那个却贴在我的身上,好比一张叶子贴在树枝上,还浑身发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对她说:坚强些,我亲爱的伊林娜!你就对我说一句告别的话吧。'她这才一面哭,一面说,每说一个字,抽一口气:我的……亲人……安德留沙……咱们……今世……就再也……见不着……见不着面啦'……

“人家看着她本来已经心碎了,但她还要说出这样的话来。其

实她应该知道,我跟他们分手也很难受,又不是到丈母娘家里去吃薄饼。这时我可火了!我用力拉开她的手轻轻地往她的肩膀上一推。仿佛是轻轻地一推,但那时我的力气大得厉害 ;她站不住脚跟,一连后退三步,跟着又伸出双手,一步步向我走来,我就对她嚷道:难道人家是这么离别的吗?我还好好儿的,你干什么提前就把我给活活地埋葬哇?!'嗯,我又抱了抱她,我看见她简直疯了……"

他讲到一半突然中断了,在一片寂静中,我听到他的喉咙里有样东西在翻腾,在咕噜咕噜地发响。别人的激动也感染了我,我斜眼瞧瞧这个讲述的人,但在他死气沉沉的眼睛里,却看不到一滴眼泪。他坐着,颓丧地低下头,只有那两只不由自主地垂下的大手在微微哆嗦,还有下巴和刚毅的嘴唇也在颤抖……

"不用了,朋友,别讲了!'我低声说,但他大概没有听见我的话。接着他尽力克制住激动,用一种变得异样的嘶哑的声音说:

"为了当时推了她一下,我就是到死,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能原谅自己呀!"

他重又沉默了好一阵。他试着又卷一支烟,可是报纸破了,烟草都撒在膝盖上。最后,他勉强卷成了一支,狠命吸了几口,这才一面咳嗽,一面接着说:

"我摆脱伊林娜,捧住她的脸吻了吻,她嘴唇却冷得像冰。我跟孩子们告了别,便向车厢跑去,在火车开动时跳上踏板。火车慢慢地离了站,在我老婆和孩子们的旁边经过。我看到我那几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挤在一块,向我挥着手,他们想笑,可是没有笑成。伊林娜用两手狠抱住胸部,嘴唇白得像纸,还在喃喃地说着些什么,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整个身子向前俯冲着,仿佛要顶着狂风开步来……她就这样一辈子留在我的脑海里:一双紧紧抱住胸部的手,两片苍白的嘴唇,一对充满泪水的睁得老大的眼睛……我

在梦里看见她，多半也会是这个样子……当时我干什么要推她呀？直到现在一想起来，心就像被一把钝刀割着似的……

“我们在乌克兰的白教堂附近编了队。发给我一辆‘吉斯5号’[①]，我坐着它开到前线。嗯，关于战争就用不着跟你讲了，你亲眼看见过，知道开头是怎么个情况。我常常收到家里的来信，但自己却偶尔才寄一封信回去。有时候你会在信里写道，一切平安，有些小接触，现在虽然退却，但不久可以集合力量，到那时就要让德国佬尝尝滋味了。可别的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日子那么沉闷，根本没心思写信。再说，我这个人也不喜欢婆婆妈妈，喊怨叫苦，最看不惯那种爱哭鼻子的家伙，他们无论有事没事，天天给老婆情人写信，眼泪鼻涕把信纸弄得一塌糊涂。说什么他的日子很难过，很痛苦，又担心被敌人打死。这种穿着裤子的畜生，流着眼泪鼻涕诉苦，找求同情，可就是不想一想，那些倒霉的女人孩子，在后方也并不比我们舒服。整个国家要依靠他们！我们的女人孩子要有怎样的肩膀才不至于被这种重担压垮呢？可是她们没有被压垮，终究支持下来了！但那些流眼泪拖鼻涕的脓包，还要写那种信诉苦，真好比拿一根木棍敲着的腿。她们收到这种信，可怜的人，就会垂下双手，再也没力气干活了。不行！你既然是个男人，既然是个军人，就得忍受一切，应付一切，如果需要这么做的话。但假如在你身上女人的味儿比男人的还要多些，那你干脆去穿上打褶的裙子，好把你那干瘪的屁股装得丰满些，至少从后面望过去也多少像个婆娘，你就去给甜菜除除草，去挤挤牛奶好了，前线可不用你去，那边没有你，那臭味儿也已经叫人够受的啦！

“不过，我连一年仗都没有打满……在这个时间里，受过两次伤，但两次都很轻；一次伤了胳膊上的肌肉，另一次伤了一条腿；第

① 苏联造的一种大汽车

一次是中了飞机上打下来的子弹，第二次是被弹片擦伤的。德国人从上头和旁边把我的汽车打了好多个窟窿。可是我呀，老兄，开头总算走运。不过，走运，走运，可最后还是走到绝路上来了……一九四二年五月，我在洛佐文基城下，在一种极其狼狈的情况下被俘虏了。德国人当时攻势很猛，但我们的一个一百二十二公厘榴弹炮炮位上差不多没有炮弹了。我的车上给装上炮弹，装得车顶都碰到了。我自己干装运活儿，做得军服的肩膀都让汗湿透了。我得鼓足劲儿赶，因为仗打到我们的跟前了。左边不知谁的坦克在隆隆地响，右边在射击，前面也在射击，并且已经闻到焦味了。

“我们汽车连的指挥员问我说：冲得过去吗，索科洛夫？其实还问这个干什么呢。同志们或许正在那边流血牺牲，难道我能呆在这儿不理不睬吗？我就回答他说：什么话！我应该冲过去，这就是了！'好吧，'他说，'那就快吧！开足马力！'

“我就开足马力赶去。我生平没有开过那样的快车！我知道运的不是土豆，运这种货得十分小心，可是弟兄们在那边空着一双手作战，一路上又是炮火连天，这时候哪儿还谈得到什么小心呢！跑了约莫六公里的样子，眼看着马上可以拐到村道、开到炮台所在的深沟里了。但这时侯我抬头一看——圣母娘娘——我们的步兵在大路两边的原野上跑着，但迫击炮弹已经在他们中间炸响了。叫我怎么办呢？总不能向后转吧？我就拼命开足马力！离炮位还有一公里的样子，车子已经跑到村道上，可是，老兄，我却没有能开到自己弟兄那儿……大概是远射炮的一颗重磅炮弹落在我的车旁了。我却没有听到爆炸，什么也没听到，听觉得头脑里好像有一样东西破裂了，别的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时怎么能保住性命，我不明白，在那离开排水沟有八米的地方躺了多久，我也没法知道。等到清醒过来，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我的脑袋抽动，浑身哆嗦，好像发寒热一样，眼睛里只是一片漆黑，左肩膀格格地发响，周身痛得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命,仿佛被人家狠狠地打了两天两夜。我在地上爬了好一陈,才勉强站了起来。但是,还是一点也不明白,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我的记性丢得干干净净。可又怕再倒下去。我怕一倒下,就再也站起不来了,就完蛋了。我站着,摇摇摆摆,就你暴风雨中的杨柳。

“等到恢复知觉,冷静下来,往四下里一望,我的心仿佛让什么人用老虎钳给夹住了 四周横七竖八地散着我运来的炮弹,我那辆车子翻倒在不远的地方,车轮朝天,车身给打得稀烂,可是战斗已经转移到我的后面去了……叫我怎么办哪?

“不瞒你说,这时候我的两腿发软,身子就像一束割下的草那样倒下来,因为我心里明白,我已经落在包围中了,说的更恰当些,给法西斯俘虏了。是的,在战争中就有这样的事……

“唉,老兄,当你清楚,你已经无可奈何成了俘虏的时候,那真是不好受呐。谁没有亲身经历过,谁就无法一下子体会这玩意儿是怎么心情。

“嗯,这样我就躺在地上,还听见坦克隆隆地响着。四辆德国中型坦克,开足马力在我旁边经过,向刚才运炮弹来的方向驶去……这叫人感到是个什么滋味?后来,牵引车拉着大炮开过,炊车开过,最后步兵也过去了,人数并不多,也许不会超过一个作过战的连吧。我望了望,用眼角向他们望了望,又把脸贴住地面,闭上眼睛 我不想看见他们,并打从心底里感到厌恶……

“我以为他们都过去了,就抬起头来,只见六个自动枪手,在离开我一百米光景的地方大踏步走来。我一看,他们又从大道上拐个弯,一直向我走来。一声不响地走来。我想:口害,我的末日到啦。我坐了起来,不愿躺着死去,便又站了起来,他们之中的一个,在离开我几步远的地方,动了动肩膀,卸下自动枪来,嗬,人这个东西真有意思 在这一刹间我既不慌张,也不胆怯。只是眼睛瞧着

他,一面心里在想:他马上要冲我来上一梭子了,可是会打在哪儿呢?打在脑袋上,还是胸膛上?仿佛他射穿我身体的哪一部分,在我反而不是一码事似的。

“这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模样儿长和倒不错,头发黑黑的,嘴唇很薄,抿成一条缝,眯起眼睛。‘这家伙会不加考虑地打死我,’我心里想。果然不错:他举起枪来了——我盯住他的眼睛,一声不响。而另外一个,也许是个上等兵吧,岁数大一些,可以说是上了年纪了,不知嚷了一声什么,把他推到一旁,走到我的面前,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德国话,支起我的右胳膊,摸摸肌肉。摸了摸之后,说:“喔——唷——唷!”接着指指道路,指指太阳落下的地方,意思是说:走吧,为我们帝国当牛马去吧。呸,摆出主人的架子来了。畜生!

“那个头发黑黑的家伙,仔细察看我的靴子——我那双靴子看上去很不错——用手指了指,意思是说:脱下。我在地上坐下来,脱了靴子,递给他。他就不客气地从我的手里一把抢了过去。我又解下包脚布递给他,并且从脚到头地打量他。他可嚎起来了,用他们的话骂着,同时又抓住了自动枪。剩下的几个都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们就平静地走开了。只有那个头发黑黑的家伙,在走到大路上以前,回头又看了我三次,像一头小狼似的闪亮眼睛,生着气,可是为什么呢?好像是我脱了他的靴子,不是他脱了我的靴子似的。

“唉,老兄,我可确实没地方躲避。只得走到大路上,恶声恶气地用花巧的伏龙涅什土话骂了一阵,开步向西方走去,去当俘虏!……当时叫我走路可的确不行,一个钟头只走了一公里,决不会更多。你心里想往前走,身子却东倒西歪,一步拖一步,好像喝醉酒的人。走不多远,一队我们的俘虏就赶了上来,都是跟我同一师的。约莫有十个德国自动枪手押着他们。那个领队的赶上我,一

句话不说,就举起了自动枪,拿枪柄用力朝我头上打了一下。我要是倒下的话,他一定一梭子把我结果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弟兄一把抱住了我,我把他推到队伍中间,扶着我走了半小时的样子。等到我清醒过来,其中一个弟兄偷偷地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千万别倒下!拼着所有的力气走吧,要不,他们会把你打死的。'我就拿着所有的力气走去。

"太阳一落山,德国人就加强了押送队,卡车又运来了大约二十个自动枪手,加快速度赶着我们往前走。我们中间那些伤重的,跟不上大伙儿,就在路上被枪毙了。有两个人想逃跑,可是没考虑到,夜里在有月亮的原野上,大家他妈的把你看得清清楚楚。嗯,当然罗,这两个也被打死了。半夜里,我们来到了一个烧剩了一半的村庄。我们就被赶进一座屋顶打坏的教堂里去过夜。石头地上没有一根麦杆,我们大家又都没有大衣,只穿着一身单军衣,因此可铺的东西一层也没有。有几个人就连上装都没有穿,只穿着粗布衬衣。这些多半是下级指挥员。他们都把军官制服脱掉了,使人家无法辨认出他们是军官还是战士。还有那些炮手也没有穿军服。他们原来光着身子在大炮旁边干,因此就这么光着身子给俘虏了。

"夜里下了好大一场雨,弄得我们个个都浑身湿透。教堂中央的圆顶不是被重炮就是被飞机炸毁了,旁边的屋顶也给弹片打得全是窟窿,连祭坛上都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只好通夜在教堂里逛来逛去,好像一群羊关在黑暗的羊圈里。半夜里我听到有人推推我的胳膊问:同志,是你没有受伤吗?'我回答他说:你要什么呀,老兄?'他又说:我是个军医,也许我能帮你些什么忙吧?'我就向他诉苦说,我的左肩正在格格地发响,肿了,痛得厉害。他断然地说:把上装和衬衣脱下。'我就把这些都脱下了,他动手用细细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摸着,疼得我眼前发黑。我把牙

齿咬得咯吱咯吱响，对他说：你准是个兽医，不是给人看病的医生。你这没心肝的，为什么在人家痛的地方按得那么重啊？'他却依旧摸着，还恶狠狠地回答说：你给我闭嘴！也想来跟我来邋嗦。等着吧，还要痛得更加厉害些呢。'说着就那么重重地拉动我的胳膊，痛得我发睛里直冒火星。

"等我清醒过来，问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呀，该死的法西斯分子？我这只胳膊让人给打碎了，可你要那么扯它，'我反而听到他轻轻地笑了起来，说：我还以为你会用右手打我，没想到倒是个挺老实的小伙子。你那只胳膊并没有被打坏，只是脱舀了，可我已经给你摇上了。嗯！现在怎么样，好一些吗？'直的，不知怎的我觉得痛慢慢地消失了。我由衷地向他道了谢，他却继续在黑暗中摸着走过去，悄悄地问：有受伤的吗？'瞧吧，这才是真正的医生！他就是当了俘虏，就是在黑暗中，还是做着自己伟大的事业。

"这是一个安静的夜晚。德国人不让我们出去大小便。这一层，当我们成双行地被赶进教堂的时候，押送队的长官就曾警言过我们了。真不凑巧，我们中间有个教待急于要大便。他忍着，忍着，忍了好一阵，后来倒哭了起来，说，'我不能亵渎渎神圣的教堂！我是个信徒，我是个基督教徒！弟兄们，叫我怎么办呢？'你知道，我们是些怎样的人吗？有的笑，有的骂，有的则给他出了各种各样可笑的主意。他弄得我们大家都很快活，可是这件倒霉事结束和却很惨：他开始敲门，哀求放他出去一下，口唐，可求出祸事来了：法西斯分子隔着门扫射了好一阵，这个教徒就被打死了：另外又死了三个人，还有一个受了重伤，到早晨就死了。

"我们把死人抬在一个地方。大家坐下了。安静下来，开始想心事，觉得事情的开头不太妙……又过了一会儿，大家压低嗓子，嘁嘁喳喳地谈起话来：谁是什么地方的，哪一省人，怎么被俘的，在黑暗中，那些同排或者同连的同志，彼此都找不到，就低低地互相

叫唤着。我听见身旁有两个人在悄悄地说话。一个说：如果明天上路以前，要我们排队，而且供出政委、共产党员和犹太人来，那你，排长，可别躲起来！这你逃不掉的。你以为脱掉上衣，就可以冒充士兵吗？不行！我可不愿替你承担责任。我第一个就把你指出来！我知道你是党员，还曾经鼓动我入党，现在你可得对自己的事责任了。'说这话的人离我很近，就坐在我的身旁，坐在我的左边，但在他的另一边，有个年轻的声音回答说：克雷日乌夫，我一向怀疑你不是个好人。特别是那次你推说不识字，拒绝入党。不过我从没想到，你会成为判徒。你不是念完了七年制学校的吗？'那个家伙却懒洋洋地回答排长说：哼，念完了，那又怎样？'他们沉默了好一阵，随后，从声音上听出来，那个排长又悄悄地说：不要出卖我吧，克雷日乌夫同志。'那个家伙却低低地笑着说：同志们都留在战线的那一边，但我可不是你的同志，你也用不着求我，反正我要把你指出来的。到底自己的性命要紧。'

"他们沉默了，但我给这么卑鄙的行为气得直打哆嗦。我心里想：呸，我决不让你这畜生出卖自己的指挥员！有我在，你就别想自己走出这教堂，你只能被人家像死牲口那样拖出去！天蒙蒙亮，我看到 我旁边仰天躺着一个阔嘴大脸的家伙，双手枕在头底下，他旁边坐着一个瘦削的小伙子，鼻孔朝天，脸色苍白，两手抱住膝盖，身上只穿一件衬衣。'嘿，'我心里想，'这小伙子是对付不了这匹胖骗马的。必须由我来结果他。'

"我推推小伙子的胳膊，悄悄地问：你是排长吧？'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这家伙要出卖你吗！'我指指躺在地上的那一个说。他又点了点头。'喂，'我说，'捉住他的脚，不要让他踢！快点儿！'我自己就扑到那个家伙身上，同时手指拼死命掐住他的喉咙。他甚至都来不及嚷一声。我在他的身上压了几分钟，才直起身来。叛徒就完蛋了，舌头也伸出来歪在一边！

“干完以后,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很想洗一洗手,仿佛我不是掐死了一个人,而只是掐死了一个虫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杀人,杀的又是自己人……不,他怎么能算是自己人呢?他还不如一个敌人,他是叛徒。我站起来,对排头说:咱们换个地方吧,同志,教堂大得很。’

“正像那个克雷日乌夫所说的那样,第二天清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教堂旁边给排起队来,并且被自动枪手们包围了。三个党卫队军官开始挑选他们觉得有罪的人。他们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指挥员,谁是政委,可是却一个也没有。也没有一个出卖同志的坏蛋。其实,我们中间几乎有半数的党员,还有指挥员,当然也有政委。在两百多人中只抓了四个人。一个犹太人和三个俄罗斯士兵。俄罗斯人遭了难,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皮肤浅黑,头发鬈曲。德国人走到他们面前,问:犹太?'他们回答是俄罗斯人,但是德国人连听都不听。‘出来!”——就完了。

“这几个可怜的人就被枪毙了,我们又被继续向前赶。那个跟我一起掐死叛徒的排长,直到波滋南始终都走在我的旁边;头一天,一路上还不时握握我的手。在波滋南,我们因为这么个缘由给分开了。

“嗯。是这么一回事,老兄,打第一天起我就想逃回自己人这边来。不过逃,一定要有把握,可是在到达波滋南、被送进正式俘虏营以前,但我一直没碰上适当的机会。到了波滋南的营里,可来了这样的机会啦:五月底,把我们派到营附近的树林子里,去给我们那些死去的战俘挖墓。当时我们的弟兄们生痢疾死了很多。有一天我一面挖着波滋南的泥土,一面向四下里望望,结果发现两个卫兵坐在地上吃点心,还有一个正在太阳下打瞌睡。我扔下铁锹,悄悄地走到一丛灌木后面……随后就一直朝太阳出来的方向跑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